

●李致忠

不惑之年又逢时

——祝贺《中国图书馆学报》创刊40周年

孔老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以切身体会归纳出来的人认识客观事物，掌握自然法则，适应客观规律的成长发展过程。也是人不断提高素养的过程。人在30岁以前主要还是学习；至30岁便要建功立业，但仍是初创阶段；到40岁则实践丰富，世事练达，开始成熟了。人如此，回顾一下《中国图书馆学报》所走过的历程，好像也有这么一个发展演化过程。

新中国诞生之后，经过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民主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摆在了6亿中国人民面前。人固然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但科学技术则是生产力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响亮口号。为配合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科研、教育的需要，图书馆情报事业也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政府的重视。协调全国图书馆工作的图书馆中心委员会产生了，图书馆在职人员深造和提高了，红专大学成立了，科技情报研究所诞生了，沟通、联络、交流、促进各地图书馆工作和经验的刊物《图书馆工作》也创刊行世了。这就是《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前身和最初形态。

《图书馆工作》创刊于1957年，其出现完全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图书馆事业与之相匹配的产物。当时的刊物规模并不大，主要内容也多是图书馆工作，学术探讨、理论研究微乎其微。这真有点像人“三十

而立”阶段的形象。但那时大革命胜利的形势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党中央、国务院有绝对权威和崇高威望。人民群众、图书馆工作者忘我劳动，职业道德空前高尚。特别是1958年，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各行各业你追我赶，力争上游。北京图书馆各部门各环节职工，发挥聪明才智，内练过硬本领，外树国馆形象。参考咨询人员为充实自己，优化服务，居然能背诵词典；书库工作人员为加强典藏管理，满足读者需求，一天在库里步行几十里，每人取归书刊居然能达到八九百种；打字、刷片、排片都各练真功，盲打无误，刷卡清晰迅捷，排片硬记笔划字顺，将图书馆工作基本知识技能的掌握推向了极致。为总结这些群众性的创造，《图书馆工作》及时提出了图书馆工作者要具备“博闻强记的知识功”、“心灵手巧的操作功”、“吃苦耐劳的体力功”。这“三功”带有浓烈的图书馆工作色彩和行业特点，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图书馆工作者，似乎都具有普遍意义。而且直到今天，它不但没有失去固有的生命力，反而愈加显示出它的行业号召力。图书馆工作者不讲博闻强记，则不论是分编、著录、标引、规范、咨询，都将大大降低效率和水平，甚至寸步难行。图书馆工作者不讲心灵手巧、操作自如，那无论是打标、排片、录入、调出，不但慢若老牛，还会错误百出。图书馆工作多是脑体并用，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体魄准备，那就干不了图书馆工作。所以《图书馆工作》关于图书馆工作者“三功”的总结和宣传，是那一时期该刊的贡献。对此我本人

记忆犹新,也推崇备至。记得我来北图善本部上班的第一天,一位事先就熟悉的老同志告诉我,记住:博闻强记是图书馆工作者的基本功。几十年来,它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它使我成长,使我成人,使我成材。这是我对《中国图书馆学报》创刊40周年的第一个祝贺,祝贺它总结宣传了图书馆的行业特点,且至今和未来仍是这个行业的基本要求。

“文革”10年,图书馆工作停顿,《图书馆工作》停刊。1975年深秋,国务院办公厅吴庆彤同志向当时的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同志传达了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目编出来。”但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政治形势险恶,总理指示无法全面落实。1977年春天,筹备工作全面展开。1978年4月准备工作就绪,在南京召开了各省市文化局负责人、各图书馆负责人及有关业务人员参加的“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周总理生前遗愿和指示,制订并通过了开展这项工作必须遵循的文件及实施步骤。这次会议虽是一项具体编目工作的部署会议,但与会者均蛰居10年,群情激奋,都想干一番事业,所以实质上成了图书馆界复苏的大会,是动员的大会。会上除讨论正题外,还建议成立图书馆学会,以便形成图书馆协调中心,推动学科研究和事业发展。1978年下半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正式提了出来,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就在这年年底,全国善本书目文件修订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除业务人员外,连王冶秋、刘季平等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上除修订善本书目编辑文件外,还正式提出组建中国图书馆学会的议题。记得王冶秋同志讲话时表态:你们要成立图书馆学会,推动学科和事业发展,我没意见。但要注意,不要把学会变成机构,不要把学会变成行政领导者任职的联席会。王冶秋同志同意了,中国图书馆学会才开始筹组。而随着中国图书馆学会的诞生,其会刊

《图书馆学通讯》也在《图书馆工作》的基础上面世了。

如果说50年代图书馆中心委员会的成立和《图书馆工作》的创刊,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向科学进军大背景的产物,那么70年代末中国图书馆学会的成立和《图书馆学通讯》的面世,便是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及科技发展大背景的产物。“文革”前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各有1个图书馆学系,并且在校中默默无闻,没有显赫的地位。改革开放、进行四化建设中,科学技术受到重视,并且逐步被提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科学技术的发展,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教育和图书馆与之相配合。所以在改革开放,进行四化建设的情况下,各地各类型图书馆突飞猛进地发展,这又促使许多高校纷纷建立图书馆专业或院系,为各类图书馆培养输送人才,使图书馆工作者队伍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用什么办法将这支队伍凝聚起来,用什么形式将这支队伍的工作体会、学习心得、探索课题、研究成果表现出来呢?《图书馆学通讯》便成了这支队伍的良师益友。《图书馆学通讯》发表过许多有价值的文章,这里无法也无需逐一加以评介。我是说在她的带动下,各省学会又几乎都有自己的会刊,这些会刊结合在一起,便营造了一种社会氛围,提高并确立了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学科,使图书馆学似乎成了一门显学。这是我对《中国图书馆学报》创刊40周年的第二个祝贺。

从《图书馆工作》到《图书馆学通讯》,大约经历30余年。我常说,图书馆工作的特点,造就了图书馆工作者的风格:谦虚务实,不尚空谈。这从《中国图书馆学报》40年名称的变迁也能体现出来。《图书馆工作》绝对是务实的刊名,反映的是实实在在的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通讯》虽已是八九十年代办的刊物了,仍谦称是本学科的内部通讯。起名者当时可能没有如此明确的严谨意识,但自谦绝对是有。而当着这个学科日益丰盈,被国家视

●黄俊贵

刊物求质量 学林显风骚

——《中国图书馆学报》40年感言

事业发展需要学科理论作指导,而学科理论研究又需要相应的学术刊物为载体。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是因为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明确的概念、反映研究对象的原理及规律,并以此构成完整的体系。尽管图书馆历史悠久,图书馆学却是一门年青的学科。1957年,我国图书馆界老前辈、著名图书馆学家刘钧先生于图书馆学刊物上发表《什么是图书馆学》论文,对图书馆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那时我国对“图书馆学”并无明确的界定,甚至对图书馆学是不是一门学科,不少人仍持疑义。《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前身《图书馆学通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种全国性图书馆学刊物,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问世的。

4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显著标志是图书馆学刊物的繁荣。目前,全国图书馆学刊物达70多种,每年发表论文达数千篇。图书馆学研究水平不再停留于图书馆事业现象及工作状态的描述,代之以学科内涵的探索;刊物内容不再囿于图书

馆传统方法、技术的研究,已延伸到图书馆学各个领域及相关学科,直至升华为文献信息或信息管理诸方面;研究方法不再限于常见的逻辑论证方法,而系统论方法、实证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文献计量方法等等纷至沓来;刊物的传播从不定期内部出版发行,逐步向定期出版,向国内外正式发行,而且刊期的主流格局也从“季刊”转向“双月刊”;刊物的品种不再是清一色的图书馆学综合性刊物,各省(市)学会主办刊物除显示地方特色外,另出现高等学校系统、儿童图书馆系统以及图书馆自动化专题研究、图书馆学论文文摘刊物;刊物编辑工作的规范化给人耳目一新,绝大部分论文都有提要、主题词、参考文献、作者简介,为国际图书馆学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作者队伍新人辈出,新思维、新观点、新理论异彩纷呈,图书馆学研究后继有人……。

毋庸置疑,在图书馆学研究的各种变化、发展中,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北京图书馆主办的《中国图书馆学报》始终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对于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促进图书

为一级学科之后,才命名为《中国图书馆学报》。《中国图书馆学报》成了中国图书馆研究园地,是中国图书馆界的最高学刊,发表了很多好文章,对于指导学科发展,培养图书馆学人才,推动图书馆事业前进,都起到了不可泯灭的作用。确实像个不惑之年的刊物,褒贬弃取、编刊技巧都很成熟了。但也难免有个别败笔,大凡一遇关系稿子、应景文章等问题,就会出现败笔。这说明不惑仍有惑,尚须更进一

步。

好在我们国家现在是春和景明,政通事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已成了基本国策。大环境为图书馆事业发展,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不惑之年又逢时,是多么值得庆幸啊!

李致忠 北京图书馆业务处处长,研究馆员